

天一

文化研究

中国藏书文化研究

徐良雄 主编



天一文化研究

中国藏书文化研究

徐良雄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徐良雄主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3.11
(天一文化研究)
ISBN 7-80602-700-9

I .中... II .徐... III .藏书-文化-中国-文集
IV.G25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348 号

书 名 天一文化研究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王伯城

封面设计 陈 杰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00 千

印 张 56

版次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02-700-9/G·322

定 价 (全套四册)120.00 元

目 录

1. 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来新夏(1)
2. 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 周少川(8)
3. 试论书院藏书与学术流变的互动关系 邓洪波(19)
4. 藏书文化与诸种文化的关系 桑良至(31)
5. 清代浙江地区学术研究昌盛与私家藏书兴旺之关系
..... 陈东辉(36)
6. 浙江古代的藏书对学术人才成长的影响 何华连(44)
7. 清代浙东学派与藏书文化 虞浩旭(52)
8. 十六国北朝官府藏书活动述论 陈德弟(61)
9. 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演变与发展概述 费渝庆(70)
10. 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之系统学解析 陈斐蓉(78)
11. 术语“目录”、“书目”的历史变革 徐忆农(89)
12. 论古代私人藏书楼的私有性质 许廷长(95)
13. 漫论族谱的收藏与研究 吴定安(102)
14. 家法族规与家族藏书 仲伟行(110)
15.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 刘洪权(120)
16. 开放寺院藏书 弘扬佛教文化 沈春樵(132)
17. 江浙私家藏书楼探访观感 范凤书(142)
18. 有趣的当代藏书家文化现象 文先国(150)
19. 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现状分析
..... 薛贞芳 刘鸣亚(157)
20. 范钦著作的三种天一阁刻本 骆兆平(165)

21. 论天一阁藏书楼对现代图书馆管理的影响.....	黄宗忠 袁琳(172)
22. 天一阁与浙东学术的渊源及其互动	袁元龙(180)
23. 天一阁历史上的几起重要事件 ——兼及相关人事及历史价值的评述	陈宁雄(199)
24. “水”与天一阁 ——从“水”文化说到天一阁保护的灵魂	徐炯明(208)
25. 钦点天下第一楼 ——乾隆与天一阁独特关系探析	袁逸(219)
26. 天一阁及其藏书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以《四库全书》与“四库七阁”为例	朱赛虹(231)
27. 恭呈家珍藏 颁赐增殊荣 ——天一阁等四大藏书楼贡献琐谈	武世俊(253)
28. 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 ——论天一阁的近代化进程	虞浩旭(262)
29. 天一阁与扬州	张树忠(273)
30. 天一阁藏书盛衰之探析	黃美燕 胡朝德(283)
31. 藏书文化积淀之天一阁	李惠珍(292)
32. 天一阁特色综述	杨一琼(301)
33. 略谈天一阁藏书观念的开放性	罗建新(309)
34. 亲民,惠众,造福桑梓,走向世界 ——关于天一阁新世纪形象与功能的思考	袁密密(315)
35. 传世堂所藏天一阁明抄本考 ——兼补《新编天一阁书目》之阙	沙嘉孙(322)
36. 常熟藏书史略	曹培根(338)

37. 贵州私家藏书汇考	刘汉忠(360)
38. 苏州私人藏书特色及其贡献	曹正元(373)
39. 古代苏州学校及其藏书	金 虹(385)
40. 古代苏州寺院藏书概述	叶瑞宝(394)
41. 论明代苏州藏书文化和藏书家的贡献.....	陈建忠 马 吉(404)
42. 文津阁与四库全书	赵 玲 于艳玲(413)
43. 文溯阁藏书聚散考	王清原(425)
44. 卢文弨四十四年批校一经 ——《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原本	王世伟(439)
45. 论灵隐、焦山两书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徐 苏(444)
46. 湘乡曾氏富厚堂藏书楼与近代四大藏书楼比较研究.....	李剑华 李 艺(453)
47. 砧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原因再探索.....	顾志兴(463)
48. 金天羽及其天放楼藏书	刘 薜(472)
49. 付跗室在浙东藏书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	徐良雄(482)
50. 伏跗室及其藏书特色	饶国庆(490)
51. 岭南近代私家藏书文化初探	陈耀盛(499)
52. 张元济与傅增湘	李性忠(508)
53. 江南“铜井寄庐”藏书考略	刘汉忠(518)
54. 我国近代重要的国家图书馆 ——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	彭 飞(528)
55. 四川凉山彝族甲骨简牍皮书古籍考略.....	熊克江 黄承宗(540)
后记.....	(546)

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来新夏

【摘要】中国藏书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数量也较多，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心态，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都很珍惜和善待民族文化的传统，视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二是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自怡行为，以藏书为手段，求得自身心态的满足。不过在对待藏书问题上却有着“藏”与“用”的分野。以藏为主的藏书家希望能将私藏“久传后世，津逮子孙”；而以用为主的藏书家，则把藏书作为嘉惠他人的物质，愿为人用。两者相衡，具有用的心态将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趋向更有好处。

【关键词】藏书家 文化心态

中国藏书家的出现很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孔子应该说是最早有私家藏书的藏书家，他以私人讲学活动打破了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状态，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孔子为了教育学生，准备教材，便搜集文献，进行“删诗书，定礼乐”的整理工作，自然地形成了私家藏书。同时由于列国诸侯争雄，需要各种不同学识的人才而争相罗致，所以就有各种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除了孔子的儒家外，还有墨家、道家、法家、阴阳

家、纵横家、兵家等等，都各以其学术，培养不同类型的“士”。这些“士”为了猎取利禄，游说各国国君，急需充实自己的学识，因而也藏有一部分书。苏秦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他第一次周游列国，失败回家，遭到家人的鄙视，于是他不顾一切冷遇，“陈箧数十”，发愤再读书，终于获得成功，为六国之相。这不正说明苏秦已有几十箱藏书吗？另外有一位辩论家惠施，学识渊博，善于论说，当时人都知道他有五车藏书。五车的计量是指简书，固然不如现代书籍量大，但在简书时代，学识也很可观。所以后人称赞他人有学问时，就引这“学富五车”的故事。藏书这一名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的《喻老篇》，文章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批驳他人论点时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

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私家藏书一直与官藏成并驾齐驱的两大渠道，特别是从唐朝开始有雕版印书以后，得书较易，于是私家藏书的人数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细。唐朝藏书万卷以上的已有十五六人。宋明以来，私家藏书日益发展，万卷以上已非个别，清朝的私家藏书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一种统计，著名藏书家已近五百人，为历来藏书家总数的一半，而这些藏书家的文化素质又都相当高。

纵观历代藏书家的文化心态，确乎有一种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都珍惜和善待民族文化的传统，视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秦始皇焚书时，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儒生，就曾把儒家经典藏于孔府夹壁墙中，保存了先秦文化，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壁藏书。表明了民间藏书这一文化现象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才感叹地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两汉之际，社会动乱不已，若干富有藏书的士人，多带着藏书，隐居山林，以保护图书免遭损失。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

进行了“采求缺文，补缀漏逸”的搜集图书工作。于是许多士人多“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使许多文献获存于世。宋代的私家藏书，在前此千年的藏书经验基础上，形成藏书家覆盖地域广，有代代相传的藏书世家，藏书家一般都是官僚兼学问家，有财力和学识，藏书家能互相交流书目，传录图书，加快文化流通等特色。明代藏书家祁承业，家中本来富有藏书，不幸火灾，藏书几乎全毁，但他决不灰心，重新搜集传抄，达十万余卷，超过原藏，成为明代晚期一大藏书家，起到了积极保存民族文化典籍的作用。清代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和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而且利用他们掌握的目录、版本、校勘、考证等专学知识整理藏书，完善藏书，在藏书事业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藏书家的另一文化心态，则是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自怡行为，以藏书为手段，求得自身心态的满足。这些藏书家把藏书视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只供自己和子弟家人享用，不允许他人染指，更妄想永远为己所有。唐朝开元时期藏书家杜暹在自己藏书的每一本书上都题上家训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头两句说明自己聚书的艰辛和对子孙的期望，固未可厚非；但末一句连借书与人都定为不孝大罪，未免过于自私。有的藏书家甚至以聚书和读书的辛劳自怡，如宋朝大学者尤袤，为了藏书而不顾“读书每至唇焦，钞书每至脱腕”的苦况，痴迷地把自己的藏书看成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充分证明，读自己的藏书将是藏书家最集中的自怡行为。明代福建藏书家徐勃，曾在《读书乐》一文中，自述读自己的藏书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说：

“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绣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

有些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都很高的藏书家，往往为了收藏佳本善刻，每于公暇，必亲自流连于书市，而以此为乐。如清初诗学者王士祯为了便于求书，特别僦居于京师广安门外慈仁寺书市附近。另一藏书家朱彝尊曾赞扬他的这种求书精神说：“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入，悉以购书。”一般人登门造访，很难见到他，但在书市却容易见到他，他也承认确有其事，曾在所著《古夫于亭杂录》中得意地记下此事说：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

言下颇有自得之乐。但当有些心目中的好书，当时因某种原因，未能及时采购入藏，而被他人捷足先登，这会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致生病。他曾在另一本杂著《居易录》中记其事说：

“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

王士祯因未能满足自己购书入藏的愿望而致病的故事，反映了他为了自怡而藏书的心态。他把这种不满足视为感情生活中的一种缺陷。这种心态一直在支配着许多藏书家。直至当代，我曾相识一位中年的善本藏书家——北京的韦力君。他没有祖传的旧藏，而是自己尽心竭力，用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聚书，终使他成为收藏宋元善本数千种的藏书家。他赏玩自己的藏书，还让朋友共享这种怡悦。他斥资定额精制契丹藏的残卷，以显示其藏书的价值。他每年用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到各地采访历来藏书楼的故址遗迹，来满足对过去藏书家的仰慕心情。

藏书家的文化心态虽然有着保护民族文化和自怡行为的共识,但在对待藏书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态度,那就是“藏”与“用”的分野。一些藏书家基于“爱物”的精神,千方百计地聚书,用各种措施来保护藏书。从秦汉以来,就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时有一位名叫曹仓的藏书家,为了修建具有较高建筑水平的藏书楼来安置藏书,专门修了一座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对藏书的爱物之心,却为后世所称道。在《旧唐志》中就盛赞“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许多藏书的设备。明代藏书家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藏书的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等,都有相应的措施。清代以来有不少藏书家更多地以佳本善刻为自怡的寄托尤其是对宋板书更为重视,深扃密藏,不轻以示人,但又情不自禁地以此自炫,如黄丕烈对宋板书达到了偏爱的境地,甚至以佞宋主人为号。他因藏有百部宋板书,便向人夸耀,命名其书斋为“百宋一廛”,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因为藏有二百部宋板书,而名其藏书楼为“皕宋楼”。

这些以藏为主的藏书家,更深层的内心隐秘是,希望能将私藏“久传后世,津逮子孙”,所以常在藏书上自题训诫。元代藏书家赵孟頫是驰名遐迩的大书法家,他出于过分钟爱其所藏而在藏书卷末自题说:“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意思是我辛勤藏书是为了子孙上进,如果子孙卖书,则连禽兽都不如。他人也不要对我的藏书有非分之想。想不到这位温文尔雅的名士,竟不顾身份,破口大骂,甚至不惜留下笔墨。明朝吕坤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的一些著作都能循循善诱地诲人不倦,没有疾言厉色的词语,但他告诫子孙世守藏书时,则非常严厉地下了死命令说:“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

卖,违者茔祠除名。”不许入葬祖坟,不许列名家祠,等于开除族籍,惩罚相当严厉。但是,这种心态上的极端私有的占有欲望,往往事与愿违,使他们本身失望。因为事实证明,没有一个藏书家能够世守其传的,所以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很断然地判定说:“诸人皆眷眷于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以这种心态对待藏书,虽然在保护民族文化上有一定贡献,但对文化的流通,则多少产生了阻碍的作用。

另一些藏书家则以一种“仁人”的精神,以“用”的心态对待其藏书。他们把自己的藏书作为嘉惠于他人的物质,愿意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非常有才华的才女,理应把藏书传之子孙,但当他发现王粲的才能后,便毅然将藏书赠与王粲,成就了王粲的文学事业。晋朝藏书家范慰有藏书 7000 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南齐藏书家崔慰祖,藏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词”。这种仁人观念,一直影响和支配着后世不少藏书家。宋代四川转运使井度,家富藏书,因子孙不长进,所以将自己的五十箱藏书,全部赠与正在编撰私藏目录的晁公武。晁公武将井氏赠书合自己的旧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于是,“日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撮其大旨论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提出一种具有“仁人”观念的口号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清代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张金吾认为深藏图书,是害书害己的行为。他说:“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与予又何裨?”他为使人了解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爱日精庐藏书志》,更明确藏书之为用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

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下至 20 世纪初，浙江绍兴名流徐树兰父子，捐书捐资兴建古越藏书楼，“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年译本新书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以备合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他们订立章程，公开借阅，成为具有近代图书馆的雏形，为藏书事业走向社会化开辟了道路。

不论藏书家具有或藏或用的不同文化心态，但他们对于保存中华文化都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但我认为，具有“用”的心态，将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趋向更有好处。

【参考文献】

[1] 来新夏等著.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4 月.

[2] 来新夏等著.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3] 任继愈等主编. 中国藏书楼[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4] 傅璇琮等主编. 中国藏书通史[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年 2 月.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地址：南开大学北新村 10 楼 18 号。邮编：300071。)

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

周少川

【摘要】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藏书初兴，明代市民文化对典籍流行倾向的影响，清代朴学考据与藏书鼎盛，考察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的相互关系。说明每一时代学术文化风尚对典籍传藏的数量、类型、范围有重要的影响；而典籍的流传也对学术文化风尚的发展变化起作用。

【关键词】春秋战国 明代 清代 学术文化 典籍
传藏

一个时代学术文化风气的演变，对当时典籍的流布和收藏有重要影响。就某一时代具体而言，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和文化风尚，即必然影响这一时代典籍收藏的内容、范围和取向。然而许多材料也说明，随着典籍收藏的积累和丰富，也会反过来推动当时学术文化风气的不断发展。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气与典籍传藏是如何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呢？本文拟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明代市民意识的兴起以及清代朴学的鼎盛等具有显著时代特点的几个阶段进行考察，以求对此问题有所认识。

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藏书初兴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时期。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学术文化从王室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发展和大踏步前进。春秋以前,我国学术处在一个“学在官府”、“官守其书”的特殊阶段,私人无著述,私家无藏书。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国语·吴语》)。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诸侯公室,学术下移进入第一个阶段。这时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有了自己的学术和教育。“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明学术文化已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学术迁移进入突破性的第二阶段,“礼下于庶人”,学术文化从王室公侯彻底解放出来,为士阶层所掌握、推广和发展。孔子是这批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编订教材和整理六经时,积累了一些藏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代私人藏书家。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士阶层获得了新的发展,他们或参政议政,或聚众讲学。于是“处士横议”,学派蜂起,诸子之学骤兴。这种风气不仅大大推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我国古代典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首先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六经经过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学者的整理加工而基本定型。其他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中,也撰写了许多代表各种学派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记载上看,先秦诸子流传至汉代的典籍就有 110 多种,而当时出现的诸子著作则必然多于此数。除诸子著作外,战国时代还有大批史书、楚辞和科技著作得以创作和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为典籍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知识源泉;活跃的学术气氛,诱发了士人学子著书立说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诸子士人为了著述宣传,或为了教育私门子弟,也迫切需要收集利用已有的典籍文献,这种生产和需求,撰述和流通的相互促进,终于带来了我国古代私家藏书活动的初兴。虽然时代久远,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先秦文献中看到一些私家藏书的记载。如《庄子·天道》篇说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而老聃不许”。墨子南游,车中“载书甚多”(《墨子·贵义》)。庄子称赞惠施博学,富于藏书,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纵横家苏秦的藏书也不少,他“夜发书,陈箧数十”,悬梁苦读,练就了游说诸侯的本事(《战国策·秦一》)。可以说,战国时期,私人藏书并不仅限于诸子各家,一些士人学子也应有所收藏。《史记·六国年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孔子后人藏书夹壁,到汉代重被发现,就是一例。秦统一后九年,即行焚书之事,故“多藏人家”应指秦以前的私藏。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的记载,可以说明先秦私人藏书已经具备一定数量的情况。

分析春秋战国学术文化演变的过程,必然看到,没有学术迁移的解放运动,就没有流布四方的文化典籍;没有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就没有典籍的不断丰富和传播。因此,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出现,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迁移、百家争鸣的产物。

二、明代市民文化影响下的藏书倾向

明代市民意识、市民文化对典籍的流传和收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市民阶层的产生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这个特殊的阶层不同于足不出户、埋头圣贤书的儒生士大夫,也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有一定的文

化需求,但不是那种专讲心性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而是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这就是明代市民文化的特性。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市民文化富于生活情趣,特具消遣性、娱乐性功能,对许多官僚士大夫来说,也是深受他们欢迎的。因此明代市民文化对于当时各阶层的藏书倾向,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明代私人藏书书目和明代书坊刻书的情况来看,经部和史部类典籍的通俗读物大量增加。经部典籍或以白文刊印《四书》、《五经》,或以图解、语录、蒙书的形式出现。史部典籍则产生许多节本、选本、摘钞本、类编本,如马维铭的《史书纂略》220卷,撮取二十一史纪传汇成一书;茅国缙的《晋史删》、王思义的《宋史纂要》、张九韶的《元史节要》等,则按原史缩写而成。杨以任的《读史四集》,凌迪知的《太史华句》、《两汉隽言》,是着眼于诸史事迹或字句词藻的史钞。唐顺之的《史纂类编》,是按类书的形式对旧史进行改编。子部典籍则有大批算书、农书、医书、法律书及家庭日用书被刻印和收藏,如《明解算法》、《指明算法》、《农桑撮要》、《田家历》、《牛经》、《读律琐言》、《详刑要览》、《尺牍》、《鲁班经》、《居家必用》以及各种内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方书、本草等医书。

市民文化对私家藏书影响最明显之处,反映在大批小说、戏曲被刊印、收藏和流传。小说、戏曲这些表现市井风情的艺术,历来为封建正统观念所鄙视,然而随着明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及其地位的逐步提高,反映这个阶层生活情趣和要求的文艺作品,却越来越受人欢迎而风行起来。早在明代前期,藏书家叶盛就在《水东日记》中描写了当时小说、戏曲的盛行,他说: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读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读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